

秋色人生

吴宗蕙 著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陕)新登字 004 号

秋色人生

吴宗蕙 著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长安路南段 376 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西安百花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6.75 印张 137 千字

1999 年 5 月第 1 版 199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

ISBN 7-5419-7191-X/I·338

定 价:9.80 元

读者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厂联系调换

厂址:西安市长延堡工业区 邮编:710061 电话:5256640

自序

少年时代，我喜爱诗歌和散文，也曾练过习作。但进入大学以后，政治运动，下矿下乡，繁重的专业课程，浩如瀚海的中外古今文学名著必读参考书，占去了课内外的全部时间，焉有精力旁骛？大学毕业后，又一直在高校从事教学、科研及编学术刊物，工作要求我倾力于中国文学的研究，我与诗歌散文创作似乎无缘了。

然而，人有七情需要抒发，以文墨为职业者，常情不自禁地将所见所闻所思所感诉诸笔端。80年代初，一篇写校园晨练的短文刊发于《鸭绿江》杂志，继之，又一篇描写北海荷池的散文见诸《羊城晚报》副刊，并被中央台配乐播送，这对我无疑是一种鼓励。但当时我正集中精力于当代文学评论特别是女作家创作的研究，无暇他顾。促使我对散文创作产生激情并欲罢不能的，是一次故地重游的偶然机缘。

1984年，建国三十五周年大典，也是我告别中南海上学求知三十年纪念。在大学同学、当时正在中南海内任职的钱其智君盛情邀请下，国庆前夕，我重返中南海，访旧寻踪。

一别三十年，中南海变化很大，当年，我们中央文委的办公大院已无从寻觅，代之以幽径和高楼。只有紫光阁依旧，西花厅依旧，中南海游泳池依旧，中南海畔多情的树木花草依旧……中南海的沧桑，在我胸中激起巨大波涛，归来后，情不能

已，写成散文《思忆与追寻——重返中南海》，发表在宁夏《女作家》上，同期配以评论，受到读者的热情关注。一石投湖，波澜迭起，中南海的故人往事纷至沓来，鲜活地重映在我的记忆中，挥之难去。正是出于对在中南海工作时期故人、挚友以及那段难忘岁月的深深怀念，我又陆续写成几组回忆中南海生活的系列散文，刊于《长城》、《文学家》、《花城》、《作家》、《河北文学》及《散文世界》上，稍后结集成《中南海之恋》，于1989年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到此，我方可以说“兼事散文创作”了。

散文是一种不拘一格，可以自由抒怀的文体。论人述事、绘景抒情、追念憧憬、佚闻趣事、人生片断、忆旧陈新，以至碑铭谏诤、哀哀悼文，均可入散文的视野。正由于此，散文具有最广泛的群众性，最庞大的读者群和作者群。从事各种职业的人均能涉足散文，许多卓有成就的小说家，其起步亦往往自散文始。散文，确是文苑中独具品格、常盛不衰的一支。

中国是散文的泱泱大国。先秦诸子、汉魏名家、唐宋八大家、前后七子、桐城派以至现当代学者文人的散文精品，琳琅满目，脍炙人口，美不胜收。漫步在历代散文家佳作之林，深感散文易学难工。

在散文创作园地里，我仍然是涉历不深的初学者。目前，我正承担着一项国家科研课题，写散文，只业余为之。当然，我非常喜爱这种宽泛自由的文学样式，愿意以散文为载体同读者进行心灵对话，情感交流与精神沟通。

散文贵“真”。收入本集中的篇章，无论悼亡忆旧或咏物记

人，皆动情之作，事俱实事，情为真情，虚情矫饰或游戏之作，不愿为也。

我期望自己在女性文学研究的同时，能以较多的精力投入女性散文的创作，抒情述怀，缘情悟理，回顾、描画丰富变幻的人生。

吴宗蕙

1997年12月18日北京花园村

目 录

- 001 自序
- 001 奉献与牺牲
——《青春的足音》之一章
- 008 琵琶情
- 014 明亮的星
——治癌军医黄传贵掠影
- 031 鸽恋
- 035 魂兮归来
- 043 刻在心上的墓志铭
——悼先父吴鸿章先生
- 049 “爆炸大王”传奇
——记冶金专家李正华
- 063 秋色人生
- 068 不落的星辰
——悼先师吴组缃先生
- 073 爱心无价
——记女教师郭继明
- 088 初上北京
- 092 诀别母亲

111 不朽的青春
——怀念杨沫大姐

119 晨珠
——校园即景

122 塔下清荷

127 秋访赵州桥

132 塞上“桃源”水母宫

136 草原行

141 承德纪行

148 羊城之夜

153 西征明珠——肇庆

160 “仙泉”启示录

163 白藤湖畔的生活流

167 夹竹桃之旅

175 春驻钦城

185 人生四季

188 莫负青春

192 天山魂

202 后记

奉献与牺牲

— 《青春的足音》之一章

多少年来，我的眼前总晃动着—个熟悉的亲爱的影子，她—直生活在我心中。

她，瘦弱苗条的身材，长圆形的稚气的脸庞，脑后挂着两条短短的小辫，白皙的脸上嵌着一对聪慧明亮的眼睛。在中南海畔的柳下花前，在怀仁堂、紫光阁、北京饭店等处的文艺晚会上，常常可以看到她快乐的身影。她年纪不大，十六七的样子，但工作、学习都很认真，显然，在三十几年前那个提倡无私奉献的年代，年轻热情、作为共青团员的她，正竭尽全力为革命献出全部光和热，不负美妙的青春。可叹的是，在婚姻问题上，她幼稚软弱，可悲地作出了无谓的奉献和牺牲。如今她生活得怎样？在追悔？在奋斗？抑或期待与寻求？

为什么作奉献？为谁去牺牲？革命、理想、祖国、人民……这些神圣崇高的字眼，如何同单个的人相联系又相区分？这在解放初期那群胸怀远大理想，决心用青春、热血和生命殉我们的事业的年轻人中，往往是混沌不清的。我们崇敬革命，自然

然而地崇敬那些曾出生入死干革命的老干部；我们信赖党，也毫无疑问地信赖作为“党的化身”的各级领导人；我们立志为理想作出奉献和牺牲，似乎也应该为老革命们作出奉献和牺牲，包括少女的豆蔻年华以至最最珍贵的爱情。虽然，有些年轻姑娘们常在背后窃窃私语：“老干部可敬不可爱。”芳心企盼着年貌相当、情趣相投的伴侣，但在组织的动员和老同志以“革命的名义”严肃堂皇的劝说下，不少姑娘怀着“为革命牺牲”的忐忑不安的心，勉强地成了某某的夫人，酿成了一幕幕遗恨终身的婚姻悲剧。她，曾与我灵犀相通、形影难离的好友晓星，就是这些“殉道者”中的一个。

晓星也住中南海，和我同在丙区，但不在一个单位上班。我和她都是周末舞会上的积极分子，同乡、同龄，都是“小鬼”。而年轻的姑娘们又极易在感情上靠近，久而久之，我们成了莫逆之交。

我的办公大院和晓星的办公室相邻，两个单位的干部们多有来往，很熟识。她们处老干部多，小青年少，晓星又不失严谨审慎，天真单纯，所以，人缘很好，老同志们无不钟爱她，年轻人也愿跟她接近。有人开玩笑说：“你要闷了，就给晓星打个电话，听听她那无忧无虑的笑声，忧愁就赶跑了。”是的，晓星爱笑，清脆爽朗的笑，快乐任性的笑，娇憨纯情的笑，无缘无故的笑，这笑，像清泉，像音乐，确能抚慰忧伤的心灵。我真爱听她的笑，也常常和她一起笑。

突然，一个时期以来，晓星的笑声少了，无邪的脸上罩上了一层淡淡的阴影。她不常参加舞会了，也不怎么和我们一起散步、谈心了，即使陪我们玩，也心不在焉，常常神情恍惚，默默凝思、走神。出了什么事？我奇怪了。

一天晚饭后，我拉着一位女友去找她，我问：

“晓星，你有心事啦？”

她一怔，随即缓缓摇了摇头：“没有。”

“干嘛不高兴？”

“谁不高兴啦？！”

于是，她又强打精神，和我们有说有笑了。不过，她的笑声中隐含着忧郁，不那么快活，有点儿勉强。可我，只要听到她的笑声，就信以为真，相信她真的没有什么不高兴的事。当时，我还只是个不懂事的小姑娘，头脑简单，哪懂得察颜观色，细心揣摸朋友的心理呢！

过了不久，一位女友悄悄告诉我：

“晓星有对象啦！”

“谁？”我大为惊异。

“他们单位的一个负责干部，老革命！”

“多大啦？”

“三十岁。”她平淡地说。解放初期，许多老干部都找年轻漂亮的爱人，大个十多岁，根本不算什么，中南海亦然。人们见怪不怪，习以为常了。

哦，晓星，一心想上学深造的晓星，胸怀宏愿的晓星，还像孩子般幼稚单纯的晓星，你呀你，找什么对象！而且，又是年长的老干部！这和她的一贯追求与志向完全相悖。当天晚上，我急匆匆地去找她了。

晓星正襟危坐，在办公室埋头复习数学。昏黄的灯光照着 她苍白的脸，人显得消瘦而没有精神。她手里握着笔，眼睛却定定地看着办公桌上的一只细瓷茶杯，呆呆地出神。我风风火火地跑进去，劈头就问：

“晓星，谁让你交男朋友的？”

她吃惊地抬起头来，默默看着我，没有出声。

“你不是想上大学吗？现在交什么朋友！”我简直有些气恼了。

她埋下眼睛，过了半天才轻声说：“他找我的。”

“你不能不理他？”我急了。

又沉默了一会儿，她才艰难地说：

“组织上找我谈了，一些老同志也劝我说：‘人家原本也有女朋友，后来在革命战争中离散了，才拖到今天。他为革命牺牲了对象，贡献了青春，你就不能为革命作出牺牲么？’”

“你怎么说的？”我的口气缓和了。

“我不晓得应该怎么说。”停了一下，她困惑地犹疑地自言自语：“她们说的，也有道理。”

面对这复杂的新情况，我也无话可说了。是呀，组织上和同志们的意见也有道理。老干部在革命斗争中出生入死，抛弃亲人，为革命不惜流血拼命，如今，我们难道不应该为他们作出牺牲么？“把一切献给党”，这不能是一句空话呀！“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他们的生命”，我们活着的人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牺牲呢？想到这里，我默然了。晓星也沉默着，皱着眉头思索着。我想，她一定也是这么想的，虽然，她并不一定爱他。奉献与爱恋、理智与感情正在她的内心激烈冲突着，所以，她才如此惶惑与苦恼。

我看她忧心忡忡的样子，拉着她的手说：“走，散步去。”

“不了，我今天的复习计划还没完成呢。”

好个勤奋的姑娘！我心里不禁升起深深的怜惜和淡淡的怅惘。我默默地深情地看了她一眼，紧紧地捏了一下她的手，

无声地走了。

晓星的婚事，在我们两个单位迅速传开了。女同志们——尤其是结了婚的老大姐们，茶余饭后，议论纷纷：

“人家政治条件好，又有文化，晓星找到这样的对象，很不错了。”

“晓星是南方大城市来的，才看不上老干部呢！”

“晓星这孩子，出身在那样的读书人家，愚着呢！一心只想念书，不愿早结婚。”

“结婚也不妨碍念书呀！我看哪，是小资产阶级情调浓，跟老干部思想感情不合拍。”

……

听到老大姐们的这些议论，一位年轻的姑娘不服气了，她说：

“晓星才十六七岁，没必要那么早谈恋爱、结婚。那位领导也真是，干嘛追着人家小姑娘不放嘛！”

她说话时，恰巧有位延安来的老大姐在场，她放下已送到嘴边的茶杯，连忙接茬：

“哟，瞧你说的！我们延安的女同志，十六七结婚，十八岁抱娃娃的多着呢！”

这种种议论，通过各种渠道，传到晓星的耳中，她的思想负担更沉重，思想斗争更尖锐了。她的心被一些尖刻的言词几乎扎出血来。

更有甚者，一些领导同志，为了“玉成”这门婚事，竟对晓星频频催促，开起玩笑来：

“小鬼，什么时候请吃糖呀？”

“唉，晓星哪，不要拖了，就定在‘五一’办事吧。”

“小鬼，定下结婚日子，早点告诉我，我通知团委和行政部门帮你好好操办操办。”

.....

晓星的决心未下，还在犹豫动摇，而周围的氛围和形势却迫使她不得不面对严峻的“既成事实”，作出痛苦的抉择。

晓星，一个参加工作不久的十几岁的姑娘，她那稚嫩的肩头怎能承受这沉沉的舆论重压？！

她，日渐消瘦了，精神萎顿了。

又拖了一段时间，终于，晓星结婚了。结婚的前一天，她躲在集体宿舍里，用毛巾被蒙着头，几乎哭了一整夜。她用辛酸的泪水告别了短促的少女时代，以“殉道者”的悲凄擦开了悲剧的序幕。

晓星的婚礼是在机关的大会议室举行的，不少领导人参加了婚礼。那天，晓星穿着一件崭新的白底红条的人造丝衬衣，米色凡尔丁裤子，棕色镂空皮鞋，这是她们处的同志们用津贴费凑起来给她买的嫁衣，老同志真像嫁女儿一般疼爱她。婚礼隆重而热闹，有负责干部的讲话，男方家长的讲话……轮到新娘新郎报告“恋爱”经过时，晓星低头红脸坐在一边，死也不吭声，那位新郎却春风满面地站了起来……

在婚礼进行中，跟随父母来看热闹的孩子，一边吃糖，一边向新娘指指点点：

“瞧，新娘掉眼泪了。”

“我妈说，她才十八岁！”

“这个阿姨跟我好着呢！”

.....

那天晚上，我几乎没有笑过。不知为什么，看着可怜巴巴

地坐在那儿低头垂泪的晓星，心里酸酸的，很不是滋味，怎么也高兴不起来。

晓星结婚第三天，就住回中南海的集体宿舍，说什么也不住那个新家，理由是“复习功课”。同志们表示惊讶，纷纷劝说她，她怎么也不听。只有我理解她，懂得她的那颗忧伤的无爱的少女的心。

晓星变了，那朗朗的轻松欢快的笑声消失了，清秀的脸庞更瘦削、更苍白了，那小姑娘一般的细细的身材显得更加柔弱。我几次问他们相处得怎么样，她总是摇摇头，不搭话，眼里含着晶莹的泪水。我困惑不安，心中不禁冒出疑问：这样的牺牲值得么？以前，人们都说：晓星这孩子哪方面都不错，将来有前途，会幸福。如今，瞧她这样子，有何幸福可言呢？

一年后，我调干上学，很少见到她。随着岁月的流逝和学习的繁忙，我们终于断绝了来往。不久前，我听人说，晓星的婚姻极其不幸，终成悲剧，三十年来，她历尽坎坷，艰辛倍尝。

我长大了，接受了高等教育，从文学和现实生活中了解到广阔的世界。如今，我深深体会到无爱的婚姻是一条多么残酷的锁链。当初的我们，多么幼稚可悲！我们分不清群体和个人、组织与成员的界限，盲目地听信、服从，轻率地奉献、牺牲！晓星的牺牲，于党，于国，于事业，于她和他个人，又有何益？

然而，是谁之过？

晓星，并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

此刻，我又想起了她，那慧美纯情的姑娘！

啊，晓星，你在哪里？

1986年10月31日

琵琶情

在民族弦乐器中，我最喜爱琵琶。

我爱琵琶，不仅因为它造型朴拙精巧，声音凝重悦耳，也不仅因为我儿时熟背王翰的《凉州曲》和白居易的《琵琶行》，前者的苍凉悲壮、后者的哀怨幽深曾激起我童稚天真的无尽幻想；稍长，王昭君怀抱琵琶凄凄出塞的动人传说又在我少女的易感的心灵里留下深广的忧愤与悲哀；还因为，它曾与我童年时代的一段难忘的岁月紧紧联系在一起。

那是抗日战争临近胜利的前夜，敌人疯狂挣扎，人民颠沛流离。当时，我跟随母亲住在苏北建阳乡下。敌伪的野蛮扫荡和奸淫掳掠逼得我们东藏西躲，于是，母亲带着我和刚出生的妹妹住到远离城镇的偏远乡村的舅舅家。

舅舅家是个大家庭，几代同堂，与我年龄相仿的孩子就有好几个：长我一岁的表哥，小我一岁的表妹，小我四岁的表弟，幼年丧母的表侄，还有丈夫外出求学、领着个四五岁的小女儿长期住娘家的表姐。加上远亲近邻的孩子，这儿简直是一个儿童世界。比起原来哥哥在县城读书、家里只有我一个小女孩的寂寞的家，这儿可热闹多了。舅舅家附近没有学校，我们无书

可读,就更加自由自在。一到这儿,我整天扎在孩子堆里,春天到野地里放野火,拔“毛针”,夏天到荷塘边钩莲蓬,扑蟋蟀,除了鬼子、伪军扫荡时要“跑跑反”,担惊受怕一阵,这个偏远的村子可算是黑暗年月中孩子们的乐园了。最使我快乐而终生难忘的是,不久,这儿又成了音乐世界。表哥的动听的琵琶声给了我们高尚的陶冶和音乐启蒙,开拓了我们的艺术视野和精神世界,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兵荒马乱中的童年生活。

到舅舅家之后,长辈们考虑让我们这般长久地“野”下去不行,住在邻县的父亲也频频带信,促我读书,给我开列背诗的功课,所以不久,舅舅便请来一位冬烘先生,设私塾,让我们坐冷板凳,整天背诵“子曰”“诗云”。这位老先生现代科学知识全不懂,只会教四书五经,而且,他那严酷拘管和刻板式的教学方法我们也受不了;每日从早到晚正襟危坐,死记硬背,谁背错一个字,就用竹板敲三记手心。这吓得我们变着法儿逃学,死活不肯再进课堂。舅舅没法,与母亲一商量,就到几十里外请来读过中学、当时正辍学在家的我姑姑家的表哥教我们,换掉了那个瘦骨伶仃、一脸晦气的老先生。表哥一来,我们的天空由阴转晴,生活顿时充满欢笑和生气。

那时,我的表哥年已弱冠,是位朴素斯文、进过洋学堂的白面书生。他对我们——这帮八、九、十岁的正在淘气年龄的表弟、表妹和侄子们,既宽容,又认真;既严厉,又亲切。他采取循循善诱的方法把现代科学、文化知识灌输给我们,比我以前在小学校读的内容更要新鲜有趣,广博诱人。我们不再借故逃学了,课堂秩序井然整肃,堂上书声朗朗,课下笑声阵阵。我们喜欢他,崇敬他,听他的话;舅舅们也都很满意。在那战火纷飞、祸患频仍的岁月,表哥的到来,不但接续了我们的学业,更

为我们的生活带来盎然的生意，开辟了一块人生的绿洲。

表哥弹得一手好琵琶！每当晚饭后安闲的时候，尤其是夏日的黄昏或秋夜的月下，表哥就领着我们，坐在庄前场院边的大树下，唱歌弹琵琶。他弹琵琶技艺娴熟，意境幽远，情意绵长，变幻多姿，色彩纷呈。他会弹许多曲子，有古曲和抒情歌曲，有当时青年学生中的流行歌曲，有动人心魄的抗日救亡的歌。他弹起琵琶来安祥而沉醉，仿佛全身心溶入音乐，我们从他那富于变化的表情中领略到乐曲的内涵意蕴。每当这时，我们这些平时坐不住的很不安分的小淘气们，全都静静地围坐在他的周围，众星拱月般的，或用胳膊支着膝盖，双手托腮，出神地听着；或者在小凳上端坐着，仰着小脸，专注于他神情的变幻；或者紧紧地挤挨着他，眼睛不离开他上下滑动、翻滚的手指，奇怪人间竟有这么一只手拨人心弦，在这不起眼的物件上发出如此和谐悦耳的音响。多么美妙神奇的世界啊！

我最喜爱在秋夜的月光下听表哥弹琵琶。那圆圆的月亮挂在黑黝黝的天上，周围的星星忽明忽灭，眨着小眼睛，月光透过大树的枝叶洒在表哥身上，微风轻摇，树影斑驳，飘忽、迷离。我们忘却了白天的烽烟和惊恐，仿佛憩歌在如诗如梦的仙境。表哥微闭着眼，灵巧的手指在弦上上下下滑动，来回拨弹，那一支支或抒情、或忧伤、或悲愤、或激扬的乐曲就从那手指下妙不可言地流出、涌出。他弹古曲《西宫词》，我仿佛看到神话般的富丽而空寂的宫殿里，夜深人静，一位绝代佳人头戴凤冠，身披霞裳，长吁短叹，黯然神伤，怨恨薄情的君主；当他弹到《渔光曲》时，我就想象在浪涛汹涌的大江大河上，一位年轻的渔家姑娘穿着破旧衣裳，跟着老渔夫撒网打鱼，轻声浅唱，哀叹租税沉重；当他弹到《松花江上》、《铁蹄下的歌女》时，我